

马来班顿同中国 民歌之比较研究

Kajian Perbandingan Mengenai Pantun Melayu
Dengan Nyanyian Rakyat Tiongkok

许友年著



開益出版社

Maison d' Editions QUAILLE

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

许友年著



开益出版社

Maison d'éditions QUAILL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书 名: **马来班顿与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
著 者: 许友年
责任编辑: 王铿
封面设计: Tonghui
出 版: 开益出版社
Maison d' éditions QUAILLE
电话: 2366 1510 传真: 2723 5039
印 刷: 开益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quaille@126.com
法国代理: 巴黎友丰书店 Librairie You Feng
电话: 01 4325 8998
定 价: 港币88元
国际书号: ISBN 962-7123-21-8

写在前面

大约是在三十多年前，即 1976 年借调北京大学东语系参加编撰《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时，我就开始对马来班顿（Pantun Melayu）产生浓厚的兴趣。这看来有些怪诞，因为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做垂死的挣扎，自己又背着莫名其妙的“黑锅”，在那样的形势下，去研究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肯定是要冒风险的。

但我认定，这是一个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世界上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华人集中在东南亚各国，研究华人对居住国的贡献，研究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等问题，理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我之所以对马来班顿情有独钟，这是因为世界上只有它可以直接同中国的《诗经》以及南方各地的民歌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无论是从格律、结构、内容，或是从艺术表现手法诸方面来考察，它们之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甚至还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看来，我的这个选择还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正是这个看来很不起眼的四行体民歌，竟包蕴了如此深奥的学问，而且还关联到中国同东南亚各国源远流长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问题，如有关古越族南下以及南岛语系等问题，仍需开展国际性的通力合作、深入挖掘和探究，才有可能获得圆满的解决。

光就民歌来说，我认为，真要读懂马来班顿，还得先学会读懂《诗经》，只有借鉴《诗经》赋比兴等的研究成果及其文化阐释，才能解决好马来班顿前后两行诗句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而破解马来班顿中纷繁复杂的各种意象等问题；只有研究好中国文明的起源，乃至古越族文化等问题，才能搞清楚中国的古越族究竟是怎样从大陆消失，又到哪里去了等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不论是《诗经·国风》或者是南方的民歌，大多是描写男女私情的情歌，而在马来班顿中还突出反映了热带岛国风情的鲜明特色。是情歌就会出现大量的性意象和性话语表达等问题，这是主流文化所不能认同或容忍的。面对这样的问题，只能抛弃旧的框框套套，大胆采用新的视角

和方法，进行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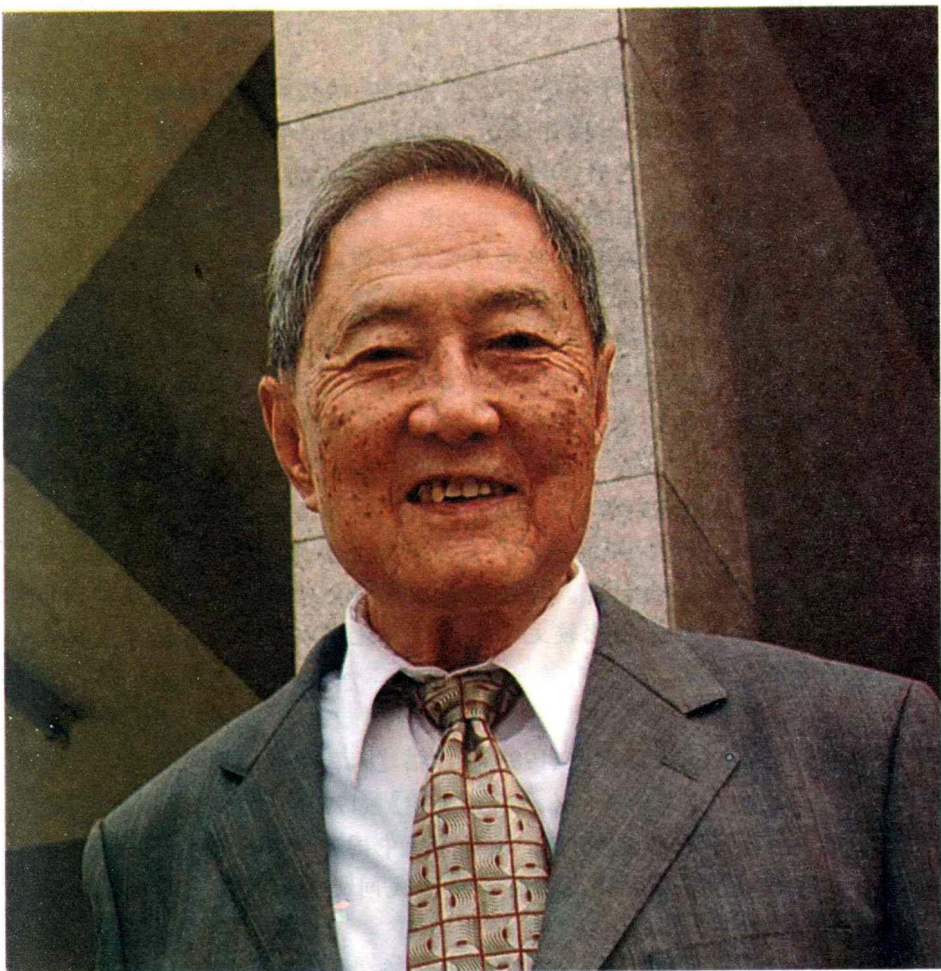
在接触闽、粤等地的客家山歌和方言时，我还考虑应将这些问题置于整个移民文化当中去考察和研究。因为他们原先都是居住在中国北方中原一带的汉人，经过千年的迁徙——定居——迁徙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交迭、认同、变迁、融合，最后才形成今天这个自成一格的语言模式和文化体系。同样的，古越族的南迁，南岛语系的形成，也经历了更为漫长、曲折、复杂、艰险的类似的过程。何况古越族面对的是浩茫的大海，他们驾着木筏或小船，顶着惊涛骇浪，逐岛漂流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各个岛屿上去。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漂流、迁徙、定居的过程中，同样要出现更为复杂的传播、涵化的过程，我们同样可以从原始移民文化的视角去追本溯源，探索究竟。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虽经多次沧桑之变和风啸雨晦的洗礼，但对那里的一切，至今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和难忘的印象。我回国也有半个多世纪，先是在中共中央机关搞研究工作，中间也曾经受过那种难以言说的“磨难”，最后才转到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按理说，这样的人生经历，对掌握和了解两国的国情直至文化蕴涵应该是有所助益的，但在研究《诗经》和马来班顿的过程中，照样要遇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需要依靠专门性的研究成果来帮助解决。在那段“苦苦求索”、“辛勤耕耘”的日日夜夜，每当找到一份新的资料，或者译好了一首班顿，我还会按捺不住那种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唯一可以告慰故交和新知的是：我虽已届耄耋之年，头脑尚属清醒，还能冷静、客观、深入地进行思考和研究，乐意为挖掘、破解马来班顿中的古老生命意识发挥余热。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领导和东南亚非通用语种基地的关心和资助，我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忱。对于香港开益出版社乐意出版此书，我除了感到欢欣鼓舞之外，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谢意。但愿我们的合作，能够为促进中国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许友年

2008-07-07 于羊城白云山麓半闲斋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许友年，1922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9-1942年在雅加达中华中学念书，1943-1945年，参加抗日活动。1946-1951年在雅加达《生活日报》任记者及编辑等职。1951年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后应中国新民王王义青年团之邀，参加1951年中国国庆观礼。1952-1958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处工作。曾参加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及八大文件印度尼西亚文版的翻译定稿工作，负责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期间所有演说的翻译定稿工作。1957年反右扩大化受牵连，全家下放山西省离石县。1962年调福建泉州华侨大学任教，后借调中联部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迪选集》一、二卷的翻译定稿工作。1973年调福建师范大学工作，1976-1981年，借调北京大学参加《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的编撰定稿工作。1983年调广州外语学院任教，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0年离休。广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及广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广东省及广州市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以及广州外语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 主要著作有：
- 《论马来民歌》(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 《印度尼西亚华人马来语文学》(1992年，广州，花城出版社)
 - 2001年9月18日，该书荣获中国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首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优秀奖。
 - 《马来民歌研究》(2001年，香港，南岛出版社)
 - 《马来语-汉语谚语词典》(双语对照)(2002年，马来西亚国家语言出版局)
 - 《印度尼西亚语-华语谚语词典》(双语对照)(2004年，

印度尼西亚 Restu Agung 出版社)等。

主要译作有：《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1983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阿布·纳瓦斯的故事》(1982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等。

内容摘要

本书是作者在其公开发表的研究马来班顿的论文与专著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收集到的最新资料，用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全面修订、补充而成；目的是为跨校、跨国进行马来班顿研究提供一个样板。

该书不仅浓缩了作者半生研究马来班顿成果的精华，而且补充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新的、颇具说服力的资料。因此不论是从研究的深度或广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材料之丰富及其论据之确凿性等等，都有很大的改进和提升。其珍贵之处还在于它填补了国内此类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日趋频繁和紧密的交流和联系，铺垫上一层厚实的文化基础。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它从源头上(族属渊源、南岛语系、文化特征以及文学艺术诸方面)深入探讨和详细论述了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几千年来在文化交流中发生的文化历程以及文化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是选择了以情歌的比较研究为突破口，把性学与民歌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人类“最深刻的真理”，最根本的人性需求，对两国的情歌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比较研究；深入研究两国民歌的文化功能，挖掘和开发了两国情歌中最真切、最直率的性与爱，揭示其中最原始的人的生命意识，使读者不仅可以尽情欣赏到优美动人的经典情歌，而且还可以从中领悟到性的本意。这样就使专著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大大增强了专著的知识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如能进而出版中英-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三种语文对照的单行本，不仅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专著应有的影响力，增强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为当前席卷全球的汉语热提供一本别开生面的，生动活泼的、情趣盎然的集阅读、研究、欣赏与学习为一体的民歌小百科了。

目 录

写在前面	(I)
作者简介	(IV)
内容提要	(VI)

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

一、马来班顿简介	(1)
二、马来班顿的格律	(2)
三、马来班顿的结构、内容、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文化功能 诸方面同中国民歌之全面比较	(54)
四、马来班顿的源流	(184)
(一) 古马来族同中国古越族的关系	(184)
(二) 百越族的共同文化特征	(205)
(三) 闽、粤方言与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的双向交流	(209)
(四) 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马来语文学	(222)

(五) 马来班顿中大量反映了中国的人和事及其风俗习惯	(232)
(六) 《越人歌》的解读和《搦有梅》的翻译	(235)
五、 结 语	(252)
索 引	(253-276)
后 记	(277-279)

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

一、马来班顿简介

马来班顿 (Pantun Melayu) 是长期、广泛流传于东南亚各国并深受群众喜爱的一种四行体民歌,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可以直接同中国的《诗经》以及南方各地民歌进行全面比较的民歌,它除了可以用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吟唱外,还可以用米南加保语 (Minangkabao)、亚齐语 (Aceh)、巴达克语 (Batak 称作 umpama 或 ende-ende)、巽他语(Sunda 称作 wawangsalan 或 sisindiran) 和爪哇语 (称作 parikan 或 wangsalan) 来吟唱。

马来班顿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马来半岛各国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思想感情,热情歌颂了热带岛国的美丽风光,强烈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马来班顿大都是由那些不知名的歌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兴口头创作的。这种发自肺腑的天籁,真挚感人,意境深远,柔美委婉,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马来班顿已成为当地社会各阶层人士喜闻乐唱的通俗歌谣。它既是群众性娱乐和交际的媒体,又是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集会,直至国王登基典礼的不可或缺的项目或内容。难怪英国学者威尔金森 (R.J.Wilkinson) 和温斯德 (R.O.Winstedt) 要说:“只有了解了班顿,才能真正了解马来人的思想感情。”

马来班顿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是一座开发不尽的文化宝藏。尤其是马来西亚等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很有分量的班顿集。如马来西亚语言出版局于1983年就出版了由柴纳尔·阿比丁·帕卡尔等编撰的含两千首班顿的《马来班顿集》(Kumpulan Pantun Melayu, disusun oleh Zainal Abidin Bakar, DBP, Cetakan Pertama, 1983); 1985年12月,马来西亚教育部又在全国15个州的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采风活动,抢救性地收录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班顿,该项活动历时15个月,

共收集了近一万首班顿，经过筛选、整理，编辑出版了一部收有 5653 首《口传马来班顿集》的精装本^①。印度尼西亚方面也有学者从事收集流传于爪哇民间的类似马来班顿的艺人传唱的民歌 (Pantun Kentrung)，但规模和数量要比马来西亚小得多。^②由此可见他们对班顿重视的程度。班顿也是六千多年前古越族从大陆南迁，逐岛漂流时撒落在赤道线上的一串串碧玉翡翠。因此我们要像珍爱在大陆硕果仅存的《越人歌》那样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准确的比较研究。

二、马来班顿的格律

马来班顿流行的歌体基本上是四行体，每首四句，每句四言（一般是八至十二个音节，较多的是十个音节）。全诗分成两个部分，前两句为比兴句，称为“pembayang maksud”或“sampiran”；后两句才是表达作者的中心思想，称为“isi”或“maksud yang sebenarnya”。这种四行诗押的是 ABAB 韵，不但押脚韵，有时还押腰韵和头韵。班顿四行诗的特点与中国四行诗的民歌体，在句式、韵律与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歌格律都是该民族语言、文化、审美情趣的历史积淀，是鉴别民歌的民族属性的可靠尺度，因此将中国民歌同马来班顿的格律进行比较研究，对了解相关民族的文明史、交往史、文化史、文学史等等，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马来班顿常在头两句，用热带岛国特有的鸟、兽、虫、鱼、植物、花果以及与大海密切相关的船只、岛屿、港湾等来打比方，也就是朱熹在《诗集传》中所说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即用“他物”起兴，或托物言情喻志，或作为开头衬韵，或作为环境景物，把客观物象与主观感情集中在一首歌里，情景交融，使诗歌更富于美学意义，更加符合诗歌艺术的本质要求，从而逐渐形成了马来班顿的含蓄隽永的民歌品味。例如：

^① Kurik Kundi Merah Saga, Kumpulam Pantun Lisan Melayu,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Kuala Lumpur, 1990.

^② Pantun Kentrung., Editor: Suripan Sadi Hutomo, Redaktur ahli: Pudentia MPSS, Yayasan Obor Indonesia Jakarta 1993

Dari mana punai melayang?
dari paya turun ke padi;
Dari mana datang sayang?
dari mata turun ke hati.

青鸪从哪儿来?
从沼泽飞进稻田;
爱情从哪儿来?
从秋波传入心田。^①

歌者以比翼双飞的青鸪作比起兴，通过青鸪的去向来烘托、渲染、突出主题——爱情从哪儿来：从秋波传入心田。正如《诗经·周南·关雎》那样，通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起兴句，以雎鸠雌雄和鸣来烘托君子追求淑女这个主题。

这首班顿的押韵情况，也是十分整齐的，每句都用“dari”（从）起头，押的是头韵；第一句末尾“melayang”（飞翔）和第三句末尾“sayang”（爱情）押韵，第二句末尾“padi”（稻）和第四句末尾“hati”（心）押韵。班顿除押头韵和脚韵外，还有押腰韵的，但它的韵律主要还是靠的韵脚，即押 ABAB 韵。我们再看下面两首班顿：

Jikalau pasang air di laut,
maukah tuan bersama mandi?
Jikalau datang ajal dan maṭ,
maukah tuan bersama mati?

如果大海涨潮，
要不要跟我一起沐浴？
如果大劫难逃，
要不要跟我一起仙逝？

这首班顿的前两句是属于单纯的兴句，与下文没有意义上的关联，只是为了起韵而已。下一首班顿的情况就不同了。

Berkawan kawan perahu nelayan,
tinggalkan teluk masuk harungan;
Merawan rawan lagu nelayan,

三五成群捕鱼船，
驶离港湾过浅滩；
传来缠绵渔歌声，

^① 本文所引的马来班顿大部分是出自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出版局出版的《马来班顿集》，Seri Sastra Nostalgia *Pantun Melayu*, Redaksi Balai Pustaka Jakarta, Cetakan ketigabelas -2003

bayangkan cinta kenang kenangan. 教我如何不心酸。

这里的起兴句与下文就有密切的联系：当渔船驶离港湾穿过海滩时，出海的渔人伤别离之情便油然而生，他们自然而然要思念留在家中的亲人，尤其是热恋着的情人。因此，兴句与下文反映热恋之情的缠绵渔歌声，自然是紧密相连了。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Jalan jalan, sepanjang jalan, singgah menyinggah di pagar orang;	东蹒跚来西逛逛， 家家竹篱外停靠；
Pura pura mencari ayam, ekor mata di anak orang.	装模作样把鸡看， 两眼偷把姑娘瞟。

Ke Teluk sudah, ke Siam sudah, ke Mekah sahaja yang belum lagi;	的鹿去过，暹罗去过， 就是麦加尚未朝觐；
Berpeluk sudah, bercium sudah, menikah sahaja yang belum lagi.	人也搂过，嘴也亲过， 就是婚礼尚未举行。

这两首班顿的兴句，乍看起来似乎与下文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但它在塑造人物形象和营造气氛等方面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惟妙惟肖地把轻浮浪子的嘴脸和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前面举过押头韵和押脚韵的例子，下面再举一个押腰韵的例子：

Air dalam bertambah dalam, hujan di hulu belum lagi teduh;	上游大雨不止， 水深有增无减；
Hati dendam bertambah dendam, dendam dahulu belum lagi sembuh.	旧恨犹未消释， 新愁又添心间。

押腰韵的是第一句的“dalam bertambah ……”对第三句的“dendam

bertambah …… ”；第二句的“belum lagi”对第四句的“belum lagi”。这首班顿的兴句是为主题塑造诗的意境，来映衬正句中的新愁和旧恨。

此外，还有连环式的班顿。这与中国福建闽西山歌的“四句头”（或叫“接尾歌”）有些相似，但接法不完全相同。“四句头”是以前一组的末尾一句作为下一组的起句，而连环式的班顿是以前一组的第二、四句作为下一组的第一、三句，这种形式多见于男女对歌。如：

Tanam melati di rumah rumah, ubur ubur sampingan dua; Kalau mati kita bersama, satu kubur kita berdua.	家家庭院栽茉莉， 海蜚成对相偎依； 要死咱俩一块死， 一个墓穴葬我你。
---	--

Ubur ubur sampingan dua, tanam melati bersusun tangkai; Satu kubur kita berdua, kalau boleh bersusun bangkai.	海蜚成对相偎依， 栽种茉莉枝架枝； 一个墓穴葬我你， 尽量做到尸叠尸。
--	--

下面谈一谈荷兰、英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学者争论了近一百年的问题，即班顿的引子和内容之间究竟有无意义上的联系？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学专家廖裕芳博士在其《马来古典文学》^①一书中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各国学者对班顿的基本看法和论点，现摘引如下：

不少学者已对班顿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对四行诗头两句与后两句之间是否有意义上的联系表示关注。拜纳波尔（Pijnappel）于1883年在莱登举行的第六届东方学者大会（Kongres Sarjana Ketimuran VI di Leiden）上发表的论文中认为班顿的前后两行诗句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① Dr. Liaw Yock Fang: *Sejarah Kesusastraan Melayu Klasik 2*, hal.195-199. Penerbit Erlangga 1993, Jakarta.

二十年后,即1904年,奥普海森(Ch.A. van Ophuijsen 1904, hal.13-14)宣誓就任教授时也谈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寻找班顿前后两行诗句之间的联系是徒劳无益的,也许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某种联系,但这跟它的本意是毫不相干的。

温斯德(Winstedt 1958, hal.163)不同意奥普海森的看法,他更倾向于拜纳波尔所提出的前后两行诗句之间有语义上的联系的观点。

威尔金森(R. J. Wilkinson 1907, hal.51-53)则认为前后两行诗句之间,的确存在着语音上的联系,头一对诗句是反映后一对诗句所包含的真意。按他的原话说:头两行诗句应该以暗含的美提供诗化的思想,而后两行诗句应以公开的方式提出同样的思想。

欧佛贝克(H. Overbeck, 1914, hal. 17-18)不同意威尔金森的看法,他认为头两行诗句没有任何意义,创作班顿的人只把注意力放在后两行诗句上,然后才去找与它相对应的韵律,前后两对诗句之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

霍伊卡斯(C. Hooykaas)在介绍各家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有的班顿的前后两行诗句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但是,好的班顿必然会有此种联系。

学者们经常议论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关班顿的起源问题。除了提出产生于“树叶语、花语、果语”等设想之外,威尔金森(Wilkinson 1907, hal. 49-501)更倾向于班顿的产生是跟马来人嗜好使用隐喻或带有暗示或启发联想的词语有关。整个头两行诗句必须引发和反映出后两行诗句的音韵。他举了下面一首班顿连同英语译文做了如上的说明:

Dari mana punai melayang
dari paya turun ke padi
Dari mana kasih sayang
dari mata turun ke hati

The fate of a dove is to fly,
it flies its nest on the knoll;
The gate of true love is the eye,
the prize of its quest is soul.